



圖書館是我的終身事業

曾堃賢

王師振鵠在《圖書館學》一書中，曾綜括各家之說，指出圖書館的意義就是：「將人類思想言行的各項紀錄，加以蒐集、組織、保存、以便於利用的機構。」對筆者而言，國立中央圖書館卻是：提供我尋求作業解答、論文參考資料、激勵我寫作逼稿成篇；進而參與圖書館事業，實現我個人圖書館員生涯的養成所。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記憶中告訴我，當我在唸大三的時候，我早已認定：圖書館事業將是我的終身事業。茲值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周年大慶，願將個人與中圖關係十六年，分成幾個階段敘述，同時這也是我個人圖書館生涯第一個階段的總回顧，並盼圖書館界前輩與先進多指教鼓勵。

尋求作業解答的寶庫

民國 66 年秋，負笈北上，來到人地生疏的——淡水，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涯。回憶當時最傷腦筋的一件事，就是上鄭師恆雄的「中文參考資料」，記得這門課安排在星期六的下午兩點到五點，每當週末來臨時，我總是眼巴巴地望著窗外吵雜的人羣，快快樂樂地提著書包回家，尤其淡水的冬天好像來的特別早，還不到下課時間，就已「天黑黑、風淒淒」了。這還不打緊，最討厭的事，就是老師的中參作業一次安排起來就是幾十題，對於剛從高中畢業的我來說，更是精神上的壓迫。經過幾次在學校圖書館查尋作業，無法完全找到解答，經學長與助教們指點以後，終於發現尋求中參作業解答，並非僅學校圖書館一途。此後搭著風光明媚的淡水線火車，轉 3 路公車到設在南海學園的國立中央圖書館，便是我四年求學當中最常作的事，也是我與中圖結緣的開始。往後大二修習胡歐蘭老師的「西文參考資料」、大三曾素宜老師的「社會科學文獻」、大四的「自然科學文獻」，其他如：西文分類編目、圖書館專題研究、圖書館行政等課程，幾乎每一學期都會到中圖報到幾次，因為它是我們

尋求作業解答的寶庫。

論文參考文獻的大本營

民國 71 年夏天，僥倖地考取文化大學史研所圖書文物組，在冥冥中好像註定了我與中央圖書館第二階段關係的開始。當時由於經濟上的因素，而採在職進修方式完成學業，所以課堂上的作業或學期報告，儘量就近利用華岡或服務的母校圖書館所典藏的資料。記得研一修吳哲夫教授的「目錄版本學」時，曾經對明朝祈承燦的藏書及其整書方法有極高興趣，這個題目幾乎成為我的畢業論文，後來因故取消，在當時所蒐集的資料也大都是從中圖影印得來。後來我提交的論文為：日據時期臺灣地區的公共圖書館事業研究，雖然泰半資料來自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珍藏之日文舊籍，但為了蒐集中國早期對於日本圖書館事業的緣起與現況研究之文獻，我幾乎翻遍了中圖所藏民國 38 年以前之舊期刊及微捲。所以此一時期與中圖關係已從總館擴及至分館。當然我也因為這篇論文，才得以有機會忝為中圖的一員。

另外，還有一件事使我終身難忘。當時曾修習王館長振鵠的比較圖書館學，由於學生僅有三人，而且其中兩人是在職進修，所以我們安排晚上在舊館的二



本館以「教義隊」參加教育部運動會，屢創佳績獲總錦標

樓會議室上課。常常因為老師上課精彩，學生發問不斷，使得下課時間往往延到九點以後，老師也知道當時我還寄居淡水，必須趕晚上十點整的校車回宿舍。所以這一學期經常有機會搭乘館長的座車，從南海路到金華街的淡江大學城區部，那時候的館長座車司機就是——鄭伯伯（鄭正安先生）。

美夢成真——實現我成為中圖的一員

民國 76 年春天，幸運地成為中圖的一員，這是我決心將圖書館員視為個人終身事業的第二個工作，同時也是我職業生涯的另一種改變。為什麼呢？就總體的大環境來說，我從私人企業——私立淡江大學的管理模式，轉換成公家機關——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行政規模；再從圖書館服務範圍的小環境來說，將從事於讀者服務——流通及參考的領域，轉換成從事技術服務——採訪及期刊管理的範疇。這五年以來，先後在胡歐蘭主任、廖又生主任、沈定濤主任、汪雁秋代主任、鄭恆雄代主任及現任辜瑞蘭主任，及林呈漢學長、秦東岱編輯、李莉茜編輯等多位先進同仁的領導與教導下，使個人不但在專業領域上獲益匪淺，同時也讓我學習到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尤其在近一年來接觸到一些行政事務，更使我感受良多。除上述個人在採訪領域裡，得到不少專業知識與工作技能之外，在這個階段中筆者自認為由於就近在中央圖書館服務的關係，五年以來得到不少意外收穫，諸如：

1. 逼稿成篇，建立我撰寫專業論文與編輯書訊的信心
向來視筆耕為畏途的我，近幾年來在同仁鼓勵與逼稿之下，先後完成六篇專業性論文與二十餘篇報導性文章，對個人來說實為一大突破。同時也利用公餘之暇，為本館館訊主編「館藏中文新創期刊選介」、中國圖書館學會之會務通訊主編「(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出版資訊」、行政院新聞局之書香月刊主筆「新創期刊選介」等專欄。上述這些資訊不但使個人充分掌握國內書刊出版動態，同時也為本館書刊之徵集工作助益不少。

2. 協助推動國際標準書號 (ISBN) 與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作業制度

民國 77 年 7 月，行政院正式核備由本館負責推展出版品國際標準書號有關事宜，同年 9 月在各相關部會的協助下，成立「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研究小組」，個人忝為一員，經半年的研究籌劃後，終於翌



每年一度員工自強活動，遍遊寶島各名勝古蹟

年 2 月完成國際標準書號實施及推廣工作研究報告。本館並於 78 年 5 月間分別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臺中市立文化中心、高雄市立圖書館舉辦三梯次的宣導座談會，並於當年 7 月 1 日起正式開始接受國際標準書號登記與編碼工作。本館又鑑於出版品預行編目作業申請時機與國際標準書號作業大抵相同，二者之作業流程亦可銜接，且國內圖書館對出版品預行編目作業需求性已達刻不容緩的地步，於是在民國 79 年 2 月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正式獲准成立之際，又同時成立「推行出版品預行編目制度研究小組」，個人也參與這項研究計畫，幾番波折後終於民國 80 年 6 月完成推行出版品預行編目制度研究報告，此項作業制度也早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展開了！如果不是中圖的一員，我根本無法躬逢此二件圖書館界大事。

3. 積極參與圖書館學會活動

自民國 78 年起，在交換處汪主任雁秋的提拔下，個人又有機會參與中國圖書館學會的各項活動，近年來分別加入研究發展、年會籌備、出版及學會年鑑編輯等幾個委員會，使個人在圖書館員職業生涯之層面更擴及到專業組織，所得到的經驗更不在話下。

最後，我也不顧內人的反對與警告，願坦誠的告訴館訊讀者，愛妻廖玉燕就是我進入中央圖書館認識的，民國 78 年我們結了婚，翌年 11 月又獲麟兒——能恩，現已兩歲四個月，我想這是我在此階段中最富意義的另一項重要收穫。當然也是因為在國立中央圖書館服務的關係，才有這種種因緣。

• 曾堃賢先生，現任本館採訪組編輯。